

农村低保会挤出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转移吗？

——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证据

韩华为

[摘要] 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本文实证考察了农村低保对老年受助者和其成年子女之间代际经济转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获得农村低保会显著挤出老年受助者来自子女的代际转移净值。从转移的方向来看，挤出效应主要体现为低保对子女向老年父母代际转移的影响，而低保对老年父母向子女代际转移的影响并不显著。从转移的构成来看，低保主要挤出了老年父母来自子女的非定期转移，而对定期转移的影响并不显著。低保对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在不同收入组群中存在异质性。低保对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仅在收入最低组群中表现显著。在评估农村低保政策效果时，研究者应该根据上述挤出效应对评估结果做出相应调整。

[关键词] 农村低保；代际转移；挤出效应；倾向值匹配

一、引言

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普遍延长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我国老龄化态势日趋严重。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更高、速度更快、老年人口规模更大^①。农村老年人面临生理机能的加速退化和更频繁的健康冲击，这不仅限制了其通过参与农业生产获取收入的能力，同时健康冲击引发的医疗费用也给其所在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大规模青壮年人口为寻求就业机会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进程中，农村地区传统的家庭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严重的冲击^②。与此同时，与城镇地区相比，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体系发展仍然相对滞后，偏低的基本养老金水平不能完全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需求^③。自身生理机能的退化、

[作者简介] 韩华为，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贫困与社会救助。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农村低保救助的瞄准、减贫效应和行为激励研究”（71703008）。

① 林宝：《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普遍性与阶段性》，《人口研究》2018年第3期。

② Huijun Liu, et al., "Family Structur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s in Rural China: The Role of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2015, 27(2).

③ 于建华等：《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及其差异性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8期。

家庭结构转变引致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农村地区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这些因素使得农村老年人成为一个贫困风险极高的群体。在当前政府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背景下,农村贫困老年人口必将成为“兜底扶贫”的重要对象。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下文简称为农村低保)是当前农村兜底扶贫体系中的核心制度。自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来,农村低保制度经历了快速的扩张。2007—2018年间,农村低保全国财政投入从109.1亿元增加到了1056.9亿元。全国农村低保平均保障标准也从2007年的840元每人每年上升到了2018年底的4833元每人每年。农村低保覆盖人口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但是截至2018年底,仍然有3519万农村人口被低保救助覆盖。无论从覆盖人口数量,还是投入资金总额来看,农村低保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减贫性公共转移项目之一^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老年人是农村低保的重要瞄准目标^②。来自民政部的管理数据显示,2013—2017年,农村低保覆盖人口中大约有40%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随着救助待遇的不断提升,农村低保所给予的现金救助,以及与低保资格相捆绑的专项救助已经构成了农村贫困老人的重要经济来源。一些研究发现,低保在降低农村老年群体的收入贫困方面效果显著^③。

在中国农村地区,受传统儒家思想和孝道文化的影响,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供养发挥着重要作用^④。尽管人口流动和家庭结构变迁削弱了这种传统的经济供养模式,但是仍然有相当大比例的农村老年父母可以从成年子女处获得代际转移^⑤,代际转移依然是农村老人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⑥。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大量证据表明,公共转移项目可能对亲子代际转移产生潜在的挤出效应,而这种挤出效应会削弱公共转移项目的减贫和再分配效果^⑦。那么,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减贫性公共转移项目之一,农村低保是否也会挤出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转移呢?考察这个问题不仅对于阐明农村低保对老年受助者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改善农村低保效果评估和优化其政策设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本文将对该问题展开严格的实证检验。

① World Bank, *The State of Social Safety Nets 2018*,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8, p.104.

② 张昊:《农村低保评审乱象的成因及治理:基于定性定量混合研究方法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1期。

③ 李振刚:《普惠性抑或选择性:农村收入保障制度对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影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10期。

④ 宁满秀、王小莲:《中国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行为动机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5年第5期。

⑤ 这里的代际转移特指包括货币和实物在内的代际经济转移,而不包括陪伴和照料等形式的代际非经济转移。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中的代际转移均特指代际经济转移。

⑥ Fang Cai, et al., *The Elderly and Old Age Support in Rural Chin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2, pp. 46-47; Xiaoyan Lei, et al., *Patterns and Correlates of Intergenerational Non-Time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CHARL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076, World Bank, 2012.

⑦ Robert Jensen, "Do Private Transfers 'Displace' the Benefits of Public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1-2); Mun Sim Lai, Meechai Orsuwan,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aiwan's Cash Allowance Program on Private Households,"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7(7); Haeil Jung, et al., "Do Public Pensions Crowd out Private Transfers to the Elderly?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 Finance*, 2016, 15(4).

二、文献回顾

从理论层面来看,公共转移是否会对亲子代际转移产生挤出效应,其主要取决于代际转移行为的动机。现有文献主要识别出两类代际转移动机,即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①。Becker最早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构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利他主义模型^②。按照该模型,成年子女的效用水平依赖于老年父母福利水平的高低,因此成年子女会出于利他动机向其父母提供代际转移。当老年父母因获得公共转移而收入提高时,成年子女会相应地减少其提供的代际转移水平。Cox则较早构建了私人转移的交换动机模型^③。在交换动机模型中,成年子女为了获得老年父母提供的服务而向其提供代际转移。当老年父母因获得公共转移而收入提高时,她或他就会要求其成年子女为每单位服务支付更高的价格。假定这种服务是一种正常商品,那么成年子女就会减少对父母所提供的需求数量。如果成年子女对父母所提供的需求富有弹性,那最终的代际转移总额就会降低^④。反之,如果成年子女对父母所提供的需求弹性不足,那么最终的代际转移总额将会上升。由此观之,如果出于利他动机,公共转移会挤出成年子女向父母的代际转移。而如果出于交换动机,那公共转移既可能挤出,也可能挤入这种代际转移。在现实中,成年子女向父母的代际转移可能同时出于利他和交换两类动机,因此基于转移动机的理论模型就难以对挤出效应的存在与否给出确定性的答案。最终,公共转移对亲子代际转移的影响效应实际上成了一个实证主导的问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子女向老年父母提供代际转移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⑤。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减贫为目标的公共转移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蓬勃兴起,一系列实证文献检验了这些公共转移项目对亲子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来自非洲和拉美的大多数证据表明,获得公共转移会挤出子女向老年父母提供的代际转移。比如,Jensen利用南非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老人家庭获得的公共养老金每增加一个货币单位,其非同住子女所提供的代际转移会减少0.25—0.3个货币单位^⑥。Cox和Jimenez对秘鲁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获得社会保障金,老年人从其子女处获得的代际转移将会提高20%^⑦。Amuedo-Dorantes和Juarez考察了墨西哥针对70岁以上老人的公共救助金对亲子代际转移的影响,结果发现,获得这项公共救助会挤出37%的来自子女的代际转移^⑧。根据Cox和Fafchamps对挤出效应的讨论,公共转移对亲子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在发展中国家中之所以

① Donald Cox, et al., "Motives for Private Transfers over the Life Cycl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Evidence for Peru,"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8, 55.

② Gary Becker,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6).

③ Donald Cox, "Motives for Private Income Transf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 95(3).

④ 代际转移总额 = 单位服务的价格 × 服务需求数量。

⑤ Xiaoyan Lei, et al., *Patterns and Correlates of Intergenerational Non-Time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CHARL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076, World Bank, 2012.

⑥ Robert Jensen, "Do Private Transfers 'Displace' the Benefits of Public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1-2).

⑦ Donald Cox, Emmanuel Jimenez, "Social Security and Private Transf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Peru,"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2, 6(1).

⑧ Catalina Amuedo-Dorantes, Laura Juarez, "Old-age Government Transfers and the Crowding out of Private Gifts: The 70 and above Program for the Rural Elderly in Mexico,"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15, 8(3).

被普遍发现,可能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①。首先,子女向老年父母的代际转移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而且数额较大。其次,在发展中国家中,这种亲子代际转移大多由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女转移向经济条件较差的老年父母,而这种转移特征更多的体现出利他动机而不是交换动机。

东亚地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将仁爱作为其伦理教导的核心,在亲子关系层面则推崇孝道文化。在此文化背景下,子女向老年父母的代际转移更多的体现为利他动机,从而可能引致公共转移对亲子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与此相呼应,在实证研究层面,公共转移对亲子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也得到大多数来自东亚地区证据的支持。比如,利用1990—2003年的调查数据,Lai和Orsuwan考察了台湾地区一项针对老年人的家计调查式公共转移项目(公共老龄津贴)对亲子代际转移的影响^②。结果发现,贫困老人每获得一个货币单位的公共老龄津贴,从其子女获得的代际转移就会减少0.3—0.5个货币单位。Gerardi和Tsai则实证检验了台湾地区一项针对老年人的普惠性公共转移项目(老年公民生活福利津贴)对亲子代际转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得到津贴的老人获得其子女代际转移的可能性会降低37%^③。另外,Jung等基于韩国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公共养老金会挤出老人从子女或兄弟姐妹处获得的经济转移,这进而显著地削弱了公共养老金对老年人的消费促进效应^④。

中国农村地区具有典型的发展中经济特征,同时又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和孝道文化的影响。近10多年来,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和精准扶贫战略的大力推进,农村老年人可以获得的公共转移水平日益提高。那么,在此背景下,公共转移是否会对农村老人获得的亲子代际转移产生挤出效应呢?由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下文简称为新农保)^⑤是直接以农村老年人为瞄准目标的公共转移项目,近年来,一系列文献基于不同的数据和实证方法检验了新农保对亲子代际转移的影响,但是得到的结论却并不一致。一方面,陈华帅和曾毅发现新农保对于老年父母获得亲子代际转移有非常显著的挤出效应^⑥。张川川和陈斌开同样发现新农保对于亲子代际转移存在挤出效应,但该效应的规模却比陈华帅和曾毅所估计的结果要小得多^⑦。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研究发现新农保并未对来自子女的代际转移产生挤出效应^⑧。其中,一些文献还进一

① Donald Cox, Marcel Fafchamps, "Extended Family and Kinship Networks: Economic Insights and Evolutionary Directions," in Paul Schultz, John Strauss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2008.

② Mun Sim Lai, Meechai Orsuwan,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aiwan's Cash Allowance Program on Private Households,"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7(7).

③ Kristopher Gerardi, Yuping Tsai, "The Effect of Social Entitlement Programmes on Private Transfers: New Evidence of Crowding Out," *Economica*, 2014, 81.

④ Haeil Jung, et al., "Do Public Pensions Crowd out Private Transfers to the Elderly?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 Finance*, 2016, 15(4).

⑤ 2014年开始,“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已经被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具体参见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⑥ 陈华帅、曾毅:《新农保使谁受益:老人还是子女?》,《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

⑦ 张川川、陈斌开:《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

⑧ 程令国等:《新农保改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吗?》,《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王翌秋、陈青霞:《养老金收入对农村家庭代际转移的影响》,《金融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Wei Huang, Chuanchuan Zhang, *The Power of Social Pensions*, Discussion Paper 10425,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2016; Manxiu Ning, et al., "Does the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Crowd out Private Transfers from Children to Paren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9, 11(2).

步指出,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水平过低,以及老人照顾孙子女所体现的代际转移交换动机是新农保未能显著挤出亲子代际转移的可能原因^①。

在当前的公共政策体系下,除新农保以外,农村老年人可以享受的另外一项大型公共转移项目是农村低保。与新农保相比,农村低保的一些政策特征使其更可能挤出子女给老年父母的代际转移。首先,被农村低保覆盖的老年人不仅可以获得高于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水平的现金救助^②,而且还可以获得医疗救助、住房救助等多种与低保相捆绑的专项救助^③。其中,医疗救助使得低保个体可以享受更高的就医报销比例,这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④。考虑到这些专项救助的附加价值,农村低保的总体待遇水平必然会远远高于新农保,这无疑会提高其挤出亲子代际转移的可能性。其次,与作为普惠性公共转移项目的新农保不同,农村低保是一项针对绝对贫困人口的瞄准性公共转移制度。从政策设置来看,获得低保的农村老人应该是贫困老人,其收入水平低、健康状况差,有些甚至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因此,低保老人获得的亲子代际转移可能更多的出于利他动机而不是交换动机,此时农村低保更可能挤出来自子女的代际转移支付。

通过对政策特征的分析表明,在老年群体中,农村低保对亲子代际转移产生挤出效应的潜在可能性比新农保更高。在现有文献中,新农保对亲子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考察,但是上述挤出效应在农村低保背景下的存在性和严重性却仍未得到严格的实证检验。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本文首次实证考察了农村低保对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亲子代际转移的影响效应,同时还探讨了这些效应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异质性。与以往相关文献相比,本文对亲子代际转移做了更为细致的分类。我们不仅按照转移发生方向区分了子女向老年父母的转移和老年父母向子女的转移,而且还按照转移的规律性区分了定期代际转移和非定期代际转移。上述分类有助于更加深入细致地分析农村低保对亲子代际转移的影响效应。

三、方法、数据和变量

(一) 实证方法

为了控制政策效应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来分析农村低保对亲子代际转移的影响效应。作为处理样本选择偏误的常用计量方法,倾向值匹配在政策效应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该方法的基本思想体现为:基于可观测的特征变量预测每

① 王翌秋、陈青霞:《养老金收入对农村家庭代际转移的影响》,《金融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Manxiu Ning, et al., "Does the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Crowd out Private Transfers from Children to Paren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9, 11(2).

② 本文基于2015年的调查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在2015年,农村低保全国平均救助水平为1900元/人/年,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基金支出为1430元/人/年。参见张婷、王三秀:《新中国70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程与基本经验》,《改革》2019年第8期;Huawei Han, Qin Gao, "Community-Based Welfare Targeting and Political Elite Captur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2019, 115.

③ 张浩森:《中国社会救助70年(1949-2019):政策范式变迁与新趋势》,《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3期。

④ 朱铭来、胡祁:《中国医疗救助的对象认定与资金需求测算》,《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3期。

一个样本被干预的倾向值,再以倾向值为标准为干预组样本匹配出控制组样本,从而构建近似随机指派的反事实框架,最终利用该框架估计出政策干预的平均处理效应。具体到本文研究背景,我们通过以下3个步骤来执行该方法。

第1步,建立农村低保获得 Logistic 回归模型。考虑到农村低保是一项针对绝对贫困人口的瞄准性公共转移制度,所以我们在该回归方程中不仅控制了个体的社会人口特征,而且还控制了个体所在家庭的经济特征。基于该模型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计算每个样本获得低保干预的倾向性分数。该回归模型表示如式(1):

$$\text{Logit}(D_i) = \alpha_0 + \alpha_1 X_i \quad (1)$$

式(1)中,下角标*i*代表第*i*个样本。 D_i 是一个虚拟变量,代表是否获得农村低保(获得=1;未获得=0)。 X_i 代表个体社会人口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此外,我们在该模型中还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这有助于控制农村低保执行在各省份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以及其他与省份相关的宏观特征。

第2步,基于上述得出的倾向性分数,我们为低保样本(干预组)匹配出与其特征相似的非低保样本(控制组)。我们主要采用半径匹配方法(caliper=0.01)来进行匹配。与其他匹配方法相比,半径匹配的一个显著优势在于,其能够利用在半径范围内尽可能多的对照组样本来获得更精确的匹配^①。此外,我们还采用最近邻匹配(k=10; caliper=0.01)和核匹配(核类型为正态分布; bwidth=0.01)两种方法对本文核心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3步,我们通过亲子代际转移在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回归校正差来估计农村低保对亲子代际转移的平均处理效应。在回归校正中,我们不仅控制了式(1) X_i 中包含的个体社会人口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而且还进一步控制了可能影响亲子代际转移的其他特征(包括居住安排模式、是否照顾孙子女,以及子女特征)。控制这些变量对亲子代际转移的影响后,倾向值匹配后的回归校正能够进一步消除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的残余差异。因此,倾向值匹配后的回归校正模型能够更好地克服样本选择偏差,从而得到更为准确的平均处理效应^②。具体来看,回归校正模型体现为在匹配后的样本(即干预组和控制组构成的总样本)中操作如式(2)的OLS回归模型:

$$T_i = \beta_0 + \beta_1 D_i + \beta_2 X_i + \beta_3 Z_i + \varepsilon_i \quad (2)$$

式(2)中, T_i 代表亲子代际转移变量, Z_i 代表 X_i 以外其他可能影响亲子代际转移的变量, ε_i 为随机扰动项,且 $\varepsilon_i \sim N(0, \sigma_\varepsilon)$ 。其他符号的含义与式(1)相同。

(二)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CHARLS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住户调查。该调查每两年追踪一次,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本研究所使用的2015年数据是CHARLS目前已经公布的最新一轮调查数据。该数据不仅包括个体社会人口特

① 为了作出区分,我们将匹配前的非低保样本称为对照组,而将匹配后的非低保样本称为控制组。

② Rajeev Dehejia, Sadek Wahba, "Causal Effects in Nonexperimental Studies: Reevaluating the Evaluation of Training Program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99, 94(448); Christina Gibson, "Privileging the Participant: The Importance of Sub-group Analysis in Social Welfare Evalu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Evaluation*, 2003, 24(4).

征和家庭经济特征信息,而且还调查了家户享受公共转移项目的情况,以及详尽的代际经济转移信息。丰富的变量信息有助于对本文主题作出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为了考察农村低保对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亲子代际转移的影响,我们以老年个体为研究对象,并且对研究样本作出如下几点限定:第一,样本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且具有农村户口;第二,考虑到未成年或在校就读的子女一般不具有对父母的经济供养能力,我们限定样本老人至少有一个年满18周岁且不在校就读的健在子女;第三,我们限定样本为那些不和子女同住的老人。在农村地区,经济资源一般在家庭内部共享。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难以准确界定同住子女和老人之间的代际经济转移^①。另外,与子女同住还可能影响非同住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转移。为了避免这些因素的干扰,我们将样本限定为不和子女同住的老人。剔除不符合限定条件的样本,同时剔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之后,我们最终获得4552个有效样本。其中,低保样本(干预组)和非低保样本(对照组)数量分别为663个和3889个。

(三) 变量设置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的亲子代际转移。这里的代际转移指包括货币和折算成货币的实物转移总额。根据转移的发生方向,我们将亲子代际转移划分为成年子女向老年父母的转移(子女→父母)和老年父母向成年子女的转移(父母→子女)。我们进一步将两者之差界定为成年子女向老年父母的代际转移净值。根据转移的规律性,我们将亲子代际转移划分为定期转移和非定期转移。其中,定期转移指规律性的经济转移,比如定期提供生活费、定期帮助支付水电费和房租,以及定期提供食品和衣服等实物。非定期转移则指不规律的、带有偶发特征的经济转移,比如因突发疾病而帮助支付医疗费和因过节而给予的现金或礼物。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有配偶的老人样本,CHARLS询问的是夫妻双方共同获得或给出的代际转移。因此,对于这些样本,我们用夫妻共同的代际转移除以2来衡量每位老人获得或给出的代际转移。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样本个体是否获得农村低保(获得=1,未获得=0)。CHARLS询问了受访家户是否获得农村低保,如果回复为获得低保,我们就将该家庭内的老人样本界定为低保个体。在Logistic模型(1)式中,我们控制了个体的社会人口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其中,个体的社会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患有慢性病,以及日常活动是否存在困难。家庭经济特征包括家庭规模、扣减医疗支出后的家庭人均转移前收入、家庭人均财产、住房结构类型、厕所类型,以及是否使用清洁炊事能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老年人具有较高的重病发病率,其医疗支出在大多数情况下较高且具有不可自由选择性(Non-discretionary)^②,因此扣减医疗支出后的家庭人均收入能够更好地度量老年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③。所以在模型(1)式中,我们通过扣减医疗支出后的家庭人均转移前收入度量样本在接受

① 宁满秀、王小莲:《中国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行为动机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5年第5期。

② 对老人来说,医疗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医疗支出,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一种自由选择,而是一种在面对外生健康冲击时不得不做出的行为。比如在罹患急性病或重病时,由于其可能带来剧烈痛苦或直接危及生命,家庭在购买医疗服务时并没有足够的选择空间,大多情况下不得不接受治疗并导致可观的医疗支出。

③ Sanders Korenman, Dahlia Remler, *Rethinking Elderly Poverty: Time for a Health Inclusive Poverty Measure*, Working Paper 189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3; Xiaoyu Wu, Lixing Li, "The Motive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to the Elderly Parents in China: Consequences of High Medical Expenditure," *Health Economics*, 2014, 23(6).

低保和代际私人转移之前的经济福利水平。此外，在倾向值匹配后的回归校正模型（2）式中，我们还进一步控制了其他一些影响亲子代际转移的变量，这些变量包括老人的居住安排模式、老人是否照看孙子女、健在成年子女数量、健在成年子女平均年龄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控制变量的设置及其描述性统计请见表1。

表1 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及其赋值	均值 / 比例	标准差
个体特征		
年龄（岁）	68.038	6.540
女性（1= 女性，0= 男性）	0.520	0.500
在婚（1= 在婚，0= 不在婚）	0.839	0.368
初中及以上（1= 初中及以上，0= 初中以下）	0.154	0.361
患有慢性疾病（1= 是，0= 否）	0.743	0.437
日常活动存在困难（1= 是，0= 否）	0.395	0.489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人）	2.078	0.904
家庭人均转移前收入（不包括低保金和净私人转移，千元）	3.376	15.946
家庭人均医疗支出（千元）	2.103	6.089
扣减医疗支出后的家庭人均转移前收入（千元）	1.272	17.313
家庭人均财产（千元）	5.252	45.670
住房为钢混或砖木结构（1= 是，0= 否）	0.786	0.410
厕所可以冲水（1= 是，0= 否）	0.284	0.451
做饭使用清洁能源（1= 是，0= 否）	0.449	0.497
居住安排		
单独居住（1= 是，0= 其他）	0.182	0.386
仅与配偶居住（1= 是，0= 其他）	0.645	0.478
与子女和配偶以外的人居住（1= 是，0= 其他）	0.172	0.378
照料孙子女（1= 是，0= 否）	0.377	0.485
子女特征		
健在成年子女数量（个）	3.336	1.458
健在成年子女平均年龄（岁）	40.448	6.649
健在成年子女平均受教育年数（年）	7.722	3.142
样本量	4552	

注：在日常活动存在困难变量中，日常活动包括穿衣、洗澡、吃饭、上下床、上厕所、控制大小便、做家务、做饭、购物、管钱和吃药，在完成上述任何一项日常活动中存在困难则定义为1，否则为0；健在成年子女定义为年满18周岁且不在上学的健在子女；家庭财产仅包括家畜家禽水产品价值、土地价值、农机具等生产性资产价值、消费性耐用品价值、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和电动车）价值，其他财产类型因为缺失值过多未纳入家庭财产变量；清洁能源包括管道天然气或煤气、沼气、液化石油气和电。

四、实证分析

(一) 代际转移模式描述性分析

表 2 描述了亲子代际转移的分布模式。总体来看,中国农村亲子代际转移的方向主要体现为成年子女向老年父母的转移。而在亲子代际转移的构成中,非定期转移的份额要远高于定期转移。具体来看,在总样本中,高达 89.05% 的老年父母能够获得来自成年子女的代际转移,而老年父母给予成年子女代际转移的比例则要低得多(33.52%)。从转移金额来看,成年子女向老年父母的平均转移金额(3800.90 元)也远高于老年父母向成年子女的平均转移金额(1171.28 元)。无论从转移发生率,还是从转移金额来看,两种方向的代际转移(子女→父母、父母→子女)均以非定期转移为主。在成年子女向老年父母的转移净值中,超过 74% 的份额来自于非定期转移。上述结论与宁满秀和王小莲基于 2011 年 CHARLS 数据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①。中国农村以非定期转移为主体的亲子代际转移模式可能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在非正规经济中从事非农就业,其收入都具有较大的波动性,代际转移的不规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转移给予方收入的不规律性;其次,作为一种风险共担机制,中国农村的亲子代际转移在很多情况下被用来应对突发的负向冲击(比如因突发疾病而发生高额医疗支出),负向冲击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代际转移的不规律性;最后,成年子女逢年过节向父母馈赠钱物是孝道文化的重要体现,而中国传统节日在一年当中的分布并不均匀,因此可能导致农村代际转移的非规律化。

表 2 还比较了代际转移在低保样本和非低保样本中的差异。总转移的统计结果表明,无论是成年子女向老年父母的转移,还是老年父母向成年子女的转移,尽管转移发生率在两个样本中的差异不太明显,但是低保样本的平均转移金额却显著低于非低保样本。进一步看,低保样本中成年子女向老年父母的平均转移净值也低于非低保样本。定期转移和非定期转移的统计结果表明,亲子代际转移在低保和非低保样本中的差异更多的表现在非定期转移中。尤其是,对于成年子女向老年父母的非定期代际转移,低保样本的平均转移金额显著低于非低保样本。低保样本中成年子女向老年父母的平均非定期转移净值也显著低于非低保样本。上述结论意味着,农村低保对成年子女向老年父母的代际转移,尤其是作为其主体部分的非定期转移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

表 2 代际转移分布模式

转移类型	总样本 (N=4552)		非低保样本 (N=3889)		低保样本 (N=663)	
	发生率 (%)	均值 (元)	发生率 (%)	均值 (元)	发生率 (%)	均值 (元)
总转移						
子女→父母 (1)	89.05	3800.90	89.03	3940.62	89.20	2896.14 ^{***}
父母→子女 (2)	33.52	1171.28	34.43	1238.62	27.59	735.20 [*]

① 宁满秀、王小莲:《中国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行为动机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5 年第 5 期。

转移类型	总样本 (N=4552)		非低保样本 (N=3889)		低保样本 (N=663)	
	发生率 (%)	均值 (元)	发生率 (%)	均值 (元)	发生率 (%)	均值 (元)
子女→父母净值 (3)=(1)-(2)	-	2629.62	-	2701.99	-	2160.94
定期转移						
子女→父母 (1)	38.57	983.08	38.64	995.17	38.15	904.77
父母→子女 (2)	12.32	303.57	12.46	329.58	11.37	135.13
子女→父母净值 (3)=(1)-(2)	-	679.51	-	665.60	-	769.64
非定期转移						
子女→父母 (1)	73.89	2817.82	73.80	2945.44	74.45	1991.37 ^{***}
父母→子女 (2)	25.98	867.72	26.47	909.05	22.83	600.08
子女→父母净值 (3)=(1)-(2)	-	1950.10	-	2036.40	-	1391.30 [*]

注：我们使用t检验来考察各类代际转移支付均值在低保样本和非低保样本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在最后一列；* $p < 0.1$ ，** $p < 0.05$ ，*** $p < 0.01$ 。

(二) 倾向值匹配及其平衡性检验

本文通过倾向值匹配方法来构造控制组。用于计算倾向值分数的 Logistic 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省份虚拟变量之后，许多能够刻画贫困风险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对是否获得农村低保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个体特征变量中，高龄、不在婚、患有慢性疾病、日常活动存在困难会显著提高老年个体获得农村低保的概率。家庭经济特征变量中，扣减医疗支出后的家庭人均转移前收入和家庭人均财产与老年个体获得农村低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与所在家庭住房为土坯、木草、窑洞等结构的老年个体相比，所在家庭住房结构为钢混或砖木的老年个体获得农村低保的概率更低。

倾向值匹配前后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之前，非常多的特征变量在干预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①。具体来看，与未获得低保的对照组样本相比，获得低保的干预组样本年龄更大、在婚比例更低、健康状况和自理能力更差，其所在家庭的收入和财产水平更低、住房及其设施条件更差。干预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通过代际转移在这两个组别之间的均值差来估计平均处理效应存在严重的样本选择偏误。基于匹配结果构建控制组之后，所有的特征变量在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不再显著。这表明，基于匹配结果构建的控制组在各类特征变量方面与干预组非常相似。在是否接受干预仅取决于这些特征变量的假设条件下，上述分组近似等价于通过随机指派构建的反事实框架，以此为基础估计低保干预的平均处理效应可以得到更为可靠的结果。

(三) 农村低保对代际转移的影响效应

表3给出了基于倾向值匹配方法估计的农村低保对代际总转移的影响效应。该表前3列给

① 平衡性检验中的匹配结果基于 caliper=0.01 的半径匹配方法。

出了通过半径匹配得到的估计结果。就农村低保对代际总转移的影响,我们主要发现以下3点结论:首先,农村低保对于老年父母从其子女处获得的代际转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得到农村低保救助会导致老年父母从其子女处获得的代际转移降低1085.77元;其次,获得农村低保对于老年父母给予成年子女的代际转移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最后,获得农村低保对于老年父母从其子女处获得的代际转移净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得到农村低保救助会导致老年父母从其子女处获得的代际转移净值降低1144.31元。表3第4—6列和第7—9列分别给出了通过K最近邻匹配和核匹配的估计结果。比较之后可以看出,基于这两种匹配方法的结果与基于半径匹配方法的结果大体一致。以上结论说明,农村低保对于老年父母从成年子女处获得的亲子代际转移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且该效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3中来自3种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均发现,除了农村低保之外,其他一些特征变量也对老年父母从成年子女处获得的代际总转移有显著的影响。家庭经济特征变量中,老年父母扣减医疗支出后的家庭人均转移前收入越高,其从成年子女处获得的代际转移水平越低。转移前收入与代际转移之间的关系为负,该结论与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一致^①。表3还显示,老年父母的家庭人均财产水平越高,其从成年子女处获得的代际转移水平越高。老人财产水平和从子女处所获代际转移之间的正向关系可能反映了代际转移中的遗产继承机制^②。老人的财产水平越高,其子女为了未来继承父母遗产而愿意为其提供更高的代际转移。居住安排模式同样对代际转移有显著的影响。和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相比,那些与子女和配偶以外的人居住的老人能够获得更高的来自子女的代际转移。在与子女与配偶以外的人居住的农村老人中,相当比例的老人是与其留守在村庄的未成年孙子女共同居住。在这种居住安排模式下,老人为共同居住的未成年孙子女提供照料,这使得老人可以获得更多的来自于外出打工成年子女汇回的代际转移。与此同时,表3也显示,照顾孙子女对老人所获来自成年子女的代际转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说明,照顾非共同居住的孙子女同样有助于提高老人来自其成年子女的代际转移。最后,子女特征对代际转移也表现出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健在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健在成年子女受教育水平越高,老年父母从其成年子女处获得的代际转移水平越高。子女数量和子女受教育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老人所归属的代际转移网络的经济能力^③。代际转移网络经济能力越高,老人可以获得的来自该网络的代际转移水平自然会越高。

基于倾向值匹配方法,我们还进一步考察了农村低保对定期代际转移和非定期代际转移的影响效应。表4结果表明,3种匹配方法一致支持,农村低保对代际转移净值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定期转移中,而农村低保对定期代际转移净值则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看,农村低保对非定期代际转移净值的挤出效应主要来自于低保对子女向父母转移的影响。那么,

① Donald Cox, Marcel Fafchamps, "Extended Family and Kinship Networks: Economic Insights and Evolutionary Directions," in Paul Schultz, John Strauss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2008.

② Taichang Chen, et al., "Do State Pensions Crowd out Private Transfer? A Semiparametric Analysis in Urba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7, 49(4).

③ Fan Cai, et al., "How Well Do Children Insure Parents against Low Retirement Income? An Analysis Using Survey Data from Urba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6, 90.

表 3 农村低保对代际总转移的影响效应

	半径匹配 (N=4542)			K 最近邻匹配 (N=3160)			核匹配 (N=4524)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转移净值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转移净值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转移净值
农村低保	-1085.772***	58.533	-1144.306***	-1178.028***	48.669	-1226.697***	-1197.774***	30.763	-1228.537***
65—69 岁 (参照组: 60—64 岁)	-485.587	-50.343	-435.244	-534.329	-182.963	-351.366	-570.808	-13.440	-557.369
70—74 岁	-633.912	-80.246	-553.666	-577.903	-239.647	-338.256	-859.840	-85.067	-774.773
75—79 岁	19.412	209.549	-190.137	223.294	61.547	161.747	-257.584	207.771	-465.355
80 岁及以上	-214.307	818.981*	-1033.29	-266.240	677.473	-943.713	-526.669	827.109*	-1353.778
女性	-167.535	213.173*	-380.708	-202.714	184.242	-386.956	-120.505	219.423*	-339.928
在婚	-779.026	-480.320*	-298.706	-466.120	-584.312**	118.192	-1167.496	-495.059*	-672.436
初中及以上	-15.778	655.300	-671.078	103.044	607.138	-504.094	61.364	708.105	-646.741
患有慢性病	-20.342	-187.734	167.392	-74.562	-130.037	55.475	18.357	-169.700	188.058
日常活动存在困难	-98.368	-65.249	-33.118	118.291	-118.329	236.620	-50.574	-93.871	43.296
家庭规模	-351.918	146.845	-498.763**	-250.858	188.341	-439.199*	-375.007	142.344	-517.351**
扣减医疗支出后的家庭人均转移前收入	-167.505**	65.235***	-232.740***	-147.965**	60.210***	-208.174***	-171.996**	66.132***	-238.128***
家庭人均财产四等分较低 (参照组: 最低)	1091.772***	139.021	952.751**	1008.398**	154.029	854.369**	1237.742**	139.137	1098.606**
较高	1589.519***	252.457*	1337.062***	1855.783***	313.080*	1542.703***	1698.493***	310.602*	1387.891***
最高	2078.622***	856.041**	1222.581**	2116.323***	738.670**	1377.653**	2199.374***	858.041**	1341.333**
单独居住 (参照组: 仅与配偶居住)	-306.124	-125.860	-180.265	408.187	-125.446	533.633	-616.431	-157.639	-458.792
与子女和配偶以外的人居住	2248.167***	-121.112	2369.279***	2429.937***	-338.398	2768.335***	2436.703***	-113.571	2550.274***
照料孙子女	819.669**	-135.517	955.186***	740.556*	-37.780	778.336*	705.674*	-151.726	857.400*
健在成年子女数量	443.295***	-26.253	469.548***	546.642***	-15.402	562.044***	442.106***	-25.167	467.273***
健在成年子女平均年龄	-17.613	-67.709**	50.096	-36.515	-62.512**	25.996	-7.131	-66.348**	59.217
健在成年子女平均受教育年数	337.187***	138.081***	199.105***	318.914***	129.931***	188.983***	331.456***	143.460***	187.996***
R-squared	0.207	0.090	0.237	0.202	0.083	0.224	0.212	0.091	0.243

注: 表中 N 代表共同支撑域内的样本数量; 半径匹配中, caliper=0.01; K 最近邻域匹配中, k=10, 并且 caliper=0.01; 核匹配中, 核类型为正态 (normal), 并且 bwidth=0.01; ***p<0.01, **p<0.05, *p<0.10。

为什么农村低保会挤出老人来自于子女的非定期转移,而对相应的定期转移没有显著影响呢?首先,正如表2所示,在中国农村地区,老人来自于子女的定期转移远低于非定期转移。由于定期转移水平更低,因此农村低保对其的挤出效应就倾向于更不显著。其次,子女给老人的非定期转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应对老人所遭遇的负向冲击,比如为老人支付医疗费用。获得农村低保后,老人可以同时享受与低保相捆绑的医疗救助。医疗救助有助于提高就医报销比例,从而显著降低自付医疗支出。在这种制度设置下,获得农村低保必然会有效降低子女为老人支付的医疗费用,从而大大降低其给予父母的非定期代际转移。

表4 农村低保对定期代际转移和非定期代际转移的影响效应

	定期转移			非定期转移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转移净值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转移净值
半径匹配 (N=4542)						
农村低保	-94.803	-63.516	-31.288	-990.969***	122.049	-1113.018***
	(135.735)	(52.537)	(142.846)	(272.893)	(189.140)	(326.685)
R-squared	0.040	0.022	0.046	0.183	0.076	0.204
K 最近邻匹配 (N=3160)						
农村低保	-139.364	-58.871	-80.493	-1038.663***	107.541	-1146.204***
	(146.862)	(56.659)	(151.945)	(280.275)	(185.860)	(329.107)
R-squared	0.044	0.016	0.045	0.171	0.076	0.189
核匹配 (N=4524)						
农村低保	-98.931	-90.254	-8.677	-1098.844***	121.016	-1219.860***
	(135.581)	(60.854)	(143.900)	(310.274)	(189.875)	(356.578)
R-squared	0.040	0.024	0.046	0.187	0.076	0.208

注:匹配后回归校正模型的自变量同表3,为了节省篇幅,本表仅汇报了农村低保的回归结果;表中N代表共同支撑域内的样本数量;半径匹配中,caliper=0.01;K最近邻域匹配中,k=10,并且caliper=0.01;核匹配中,核类型为正态(normal),并且bwidth=0.01;***p<0.01,**p<0.05,*p<0.10。

(四) 异质性分析

公共转移对私人转移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可能存在异质性。Cox等通过理论分析指出:当转移接受方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私人转移会更多出于利他性动机;而当转移接受方收入水平较高时,则私人转移会更多出于交换性动机^①。将该结论应用到本文研究背景下则不难得出如下推论:当老人的收入较低时,子女更多出于利他动机而给予代际转移,此时获得农村低保更倾向于挤出代际转移;而当老人收入更高时,子女给老人的代际转移则更多出于交换动机,因此获得农村低保对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更可能不显著。从低保政策实践来看,尽管

① Donald Cox, et al., "How Responsive Are Private Transfers to Income? Evidence from a Laissez-faire Econom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

表5 收入五等分群体中农村低保对代际转移的影响效应

	半径匹配			K 最近邻匹配			核匹配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转移净值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转移净值	子女→父母	父母→子女	转移净值
总转移									
收入五等分最低	-2670.788**	-264.624****	-2406.163**	-2441.247**	-355.164**	-2086.083*	-2888.465**	-394.919**	-2493.546**
收入五等分较低	-94.104	162.054	-256.158	-41.979	183.924	-225.904	-122.224	162.438	-284.662
收入五等分居中	-2.294	-80.288	77.994	-9.359	-31.840	22.481	0.483	-79.677	80.160
收入五等分较高	-270.774	-132.655	-138.118	-242.036	-48.446	-193.590	-275.670	-141.362	-134.308
收入五等分最高	-18.275	1858.613	-1876.888	-172.933	1710.807	-1883.740	-4.859	1821.602	-1826.461
定期转移									
收入五等分最低	38.482	-183.489**	221.971	-155.766	-268.433**	112.667	5.753	-304.429*	310.181
收入五等分较低	1.990	115.540**	-113.551	25.105	139.459**	-114.354	-4.208	116.460**	-120.668
收入五等分居中	146.303	-1.486	147.789	142.030	-4.375	146.405	146.092	-0.922	147.014
收入五等分较高	-85.550	-21.585	-63.965	-84.038	-6.065	-77.973	-77.434	-22.096	-55.338
收入五等分最高	-26.489	-531.593	505.104	53.713	-497.079	550.792	-26.354	-552.800	526.445
非定期转移									
收入五等分最低	-2709.269****	-81.135	-2628.134****	-2285.480**	-86.730	-2198.750**	-2894.218****	-90.491*	-2803.728****
收入五等分较低	-96.094	46.514	-142.608	-67.084	44.466	-111.550	-118.016	45.978	-163.994
收入五等分居中	-148.597	-78.802*	-69.795	-151.389	-27.465	-123.924	-145.609	-78.755*	-66.854
收入五等分较高	-185.223	-111.070	-74.154	-157.998	-42.381	-115.617	-198.236	-119.266	-78.970
收入五等分最高	8.214	2390.206	-2381.992	-226.646	2207.885	-2434.532	21.495	2374.401	-2352.906

注：除了未包含扣减医疗支出后的家庭人均转移前收入之外，匹配后回归校正模型的自变量同表3，为了节省篇幅，本表仅汇报了农村低保的回归结果；半径匹配中，caliper=0.01；K 最近邻域匹配中，k=10，并且 caliper=0.01；核匹配中，核类型为正态（normal），并且 bwidth=0.01；***p<0.01，**p<0.05，*p<0.10。

农村低保应该以贫困人口为瞄准对象,但是众多的评估结果发现农村低保的错保较为严重,非贫困人口获得低保的现象并不少见^①。换句话说,在现有的低保政策执行中,不仅低收入老人会获得低保,那些中高收入老人同样可能获得低保,这为我们检验低保对代际转移挤出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异质性提供了可能性。

按照“扣减医疗支出后的家庭人均转移前收入”从低到高的顺序,我们将总样本划分为5个样本量相等的组群。同样基于倾向值匹配方法,我们分别在这些收入五等分组群中考察了农村低保对亲子代际转移的影响效应。表5基于3种匹配方法的结果均表明,在收入五等分最低组群中,农村低保对老年父母来自于成年子女的代际总转移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这种挤出效应在收入更高的其他组群中则并不显著。该实证结论与Cox等给出的理论推断相一致^②:即贫困老人所获得的来自于子女的代际转移主要体现为利他性动机,因此获得低保会对这种代际转移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于那些错保的非贫困老人,其所获代际转移更多出于交换动机,所以低保对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我们还区分定期转移和非定期转移来考察上述挤出效应的异质性。表5结果表明,对非定期转移的挤出效应在五等分组群中存在异质性。具体来讲,低保获得对非定期转移的挤出效应在收入五等分最低组群中表现显著,而在收入更高的其他4个组群中不显著。然而,上述挤出效应的异质性在定期转移中却并不存在。

五、结论与讨论

在近年来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农村低保对象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0%左右,这表明老年贫困人口已成为农村低保瞄准的重要目标。作为一项以兜底扶贫为目标的公共转移项目,农村低保对于老年人口的减贫效应不仅取决于其瞄准效果的优劣和待遇水平的高低,而且还取决于该项目是否会对相关主体产生负向行为激励。对于老年人来说,上述负向行为激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为,农村低保是否会挤出其来自于子女的代际经济转移。在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下,来自于子女的代际转移一直是农村老人的重要经济来源。如果获得低保对来自于子女的代际经济转移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那么农村低保对老年人口的经济减贫效果将会被大大削弱。由此观之,深入探讨这种挤出效应的存在性和严重性对于更准确地评估农村低保减贫效果以及进一步优化低保政策设置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本文实证检验了农村低保对老年受助者和其成年子女之间亲子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总体来看,获得农村低保会显著挤出老年受助者来自于成年子女的代际转移净值。针对不同方向代际转移的检验结果表明,农村低保对成年子女→老年父母的代际转移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对老年

① 韩华为:《农村低保户瞄准中的偏差和精英俘获:基于社区瞄准机制的分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2期;韩华为、高琴:《代理家计调查与农村低保瞄准效果:基于CHIP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6期。
② Donald Cox, et al., "How Responsive Are Private Transfers to Income? Evidence from a Laissez-faire Econom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

父母→成年子女的代际转移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区分定期转移和非定期转移之后的检验结果表明,农村低保会显著挤出老年受助者来自于成年子女的非定期代际转移,而对定期转移的挤出效应却并不显著。将总样本按照收入五等分分组后的检验结果表明,农村低保对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在不同收入组群中存在异质性。具体来讲,农村低保对老年受助者来自于子女的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在收入最低组群中表现非常显著,但是上述挤出效应在收入更高组群中则并不存在。

本文结论意味着农村低保会对老年受助者子女的代际转移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激励,从而导致子女减少向其老年父母的经济转移。对于贫困受助者来说,农村低保对其子女的这种负向行为激励尤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低保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福利并不能全部由老年贫困受助者享受,其子女通过降低对其父母的代际转移间接地“分享”了部分低保待遇。因此,上述负向行为激励实际上严重削弱了农村低保对老年受助者的经济减贫效应。上述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即研究者在评估农村低保的政策效果时,不能简单地通过低保金数额来测算老年受助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还必须考虑到农村低保对包括家庭代际转移在内的其他收入来源的挤出效应,否则可能会高估农村低保对于老年受助者经济层面的减贫或福利改善效果。

那么,农村低保对代际经济转移的挤出效应是否必然会降低受助老人的总体福利水平呢?根据上文分析,这种挤出效应会对受助老人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对代际经济转移的挤出效应也可能对受助老人的非经济福利产生正面效应。首先,在农村低保挤出来自于子女的代际经济转移之后,受助老人降低了对子女的经济依赖,这可能会缓解由于这种经济依赖导致的亲子之间的关系冲突,从而提高受助老人的关系性福利水平。其次,与子女给予的代际转移相比(以非定期转移为主),按期获得的低保金收入更加规律,这有助于提高受助老人的经济安全感。最后,在上述挤出效应作用下,虽然子女降低了对老年父母的经济转移,但在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下,子女可能通过增加对老年父母的非经济转移来补偿经济转移的减少。比如子女可能会向老年父母提供更多的陪伴和照料,这对于改善老人心理福利状况有重要作用。考察农村低保对代际非经济转移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上述各类机制对受助老人总体福利水平的影响将是未来研究拓展的重要方向。

Will Rural Dibao Crowd-ou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from Children to Their Aging Parents? Evidence from CHARLS

Han Huawe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Using national survey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in 2015 and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method,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rural Dibao participa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aging par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bao participation had a significant crowding-out effect on ne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from children to their aging parents. While Dibao could crowd-out the transfers from children to their aging parents, this effect in the reverse direction on the transfer from aging parents to their children was not significant. Dibao had a notable crowding-out effect on irregular, rather than regular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heterogenous effects across income quintiles. Only for the group with the lowest income could Dibao crowd-ou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Researchers should adjust for the crowding-out effect in the impact evaluation of rural Dibao.

Key words: rural Dibao;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crowding-out effects; PSM

(责任编辑:李莹)